

# 索罗金对性革命的批判： 半个世纪后的回顾

Pitirim A. Sorokin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A Review after Half a Century

关启文 香港浸会大学

Kai-man Kwa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英文提要]

Pitirim Sorokin is a famous American sociologist who had written a critique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almost half a century ago. Although he is not an explicitly Christian ethicist, what he defends is in fact very close to Christian values. In Hong Kong, a sexual revolution is taking place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learn from Sorokin how to give reasonable criticism of the ideology of sexual liberation based on reason and research. I will first provide a survey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the west. Then I will summarize Sorokin's analysis of and arguments against the sexual revolution, and his ideas of sex, love and humanity. I contend that much of Sorokin's analysis is still valid today. In fact he has exhibited amazing fores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xually liberated society. I will briefly discuss Sorokin's critique and provide more contemporary data that corroborate his viewpoint. Lastly, I will briefly indicat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 一、引言

本文介绍索罗金 (Pitirim A. Sorokin, 1889—1968) 对性革命的评论, 香港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认为: “索罗金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 同时也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sup>①</sup> 索罗金于 1889 年 1 月 21 日在俄国一个村庄透雅 (Turya) 出生。1919 年至 1922 年他在圣彼得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 但因反对列宁与共产主义而二次被捕。1923 年他被放逐, 翌年来到美国, 1924 年至 1930 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教授。1931 年他被聘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第一位教授与系主任, 哈佛大学社会系便是他所创设的, 同年归化美国, 成为美国公民。直至 1959 年退休为止, 他都任教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他在美国社会学界地位崇高, 如 1965 年他被选为美国社会学主席, 直到 1968 年。他有三十余本著作, 早期的包括《社会移动》 (*Social Mobility*, 1926) 及《当代社会学说》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1928), 而最具学术价值的则应是他四巨册的《社会与文化动力学》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1937—1941)。

索罗金不甘心只在象牙塔中作知识分子, 他积极扮演社会批评家兼教育家的角色, 他的《我们时代的危机》 (*Crisis of Our Age*, 1941) 一书 “不啻是对现代人振聋发聩的暮鼓晨钟”<sup>②</sup>。书中对感官文化有深刻的批判, 虽然写于 61 年前, 但在今天仍然

---

<sup>①②</sup> 金耀基: 《美国的性革命: 评价 P.A. Sorokin 的 “美国的性革命”》, 载《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 台北, 时报出版公司, 1982。

甚为適切。为了矫正社会弊病，索罗金把 20 个寒暑的晚年奉献给了“利他主义与爱”的理想，为此他在哈佛大学创设了一个研究机构。他于 1951 年出版了《利他主义与爱》；1954 年印行《利他性与精神性成长的方式与技巧》和《爱的方式与力量》。由于索罗金拥有博雅学识、精确的洞察力和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良心，所以不少人相信“他的地位足以和史宾格勒（今译斯宾格勒）、罗素、爱因斯坦、汤恩比（今译汤因比）、史怀哲诸位大师并列在二十世纪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之内”<sup>①</sup>。

索罗金对性革命的评论可说是他对感官文化的批判的延续，他的 *The American Sex Revolution*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在 1956 年出版<sup>②</sup>，此书源自他 1945 年 1 月 3 日在 *This Week* 杂志所发表的“*The Case Against Sex Freedom*”一文，该文发表后引起各界热烈的反应，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很多人希望索罗金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及用更通俗的方法解释，这就是 *The American Sex Revolution* 成书的背景。为何要在神学期刊讨论索罗金对性革命的批判呢？原因在于他没有以基督教伦理学家的身份写作，他的批判也多以功利主义的角度着墨，而且，他对性、爱和婚姻合一的理想，和他对爱的力量的信心，只能就他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无论是俄国的东正教或美国的新教）才可充分理解。整体来说，他对性革命的批判，的确反映一种基督教价值观，事实上他的“*The Case Against Sex Freedom*”一文就被一个宗教团体发行了数十万份。性革命的西洋风今天已侵袭香港，我

<sup>①</sup> [美] 索罗金：《现代潮流与现代人》，蔡仲章译，见新潮文库编辑部编：《关于索罗金及其作品》，3 页，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

<sup>②</sup> 此书有中译本，见 [美] 索罗金：《美国性革命》，邱义仁译，台北，绿园出版公司，1976。英文原著和这译本都已绝版，不容易找到，为了使读者对索罗金的思想有第一手的认识，本文会大量引用这译本的译文，页数则放在正文的括弧内。

们可以从索罗金学习如何一方面持守基督徒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以经验数据、研究和理性分析去支持信仰立场,以使我们能保留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介绍他的思想之前,先介绍性革命的背景。

## 二、西方的性革命:历史的回顾

金耀基这样描述性革命:“二十世纪在人类史上是一个空前大变动的时代。……在众多的革命之中,有一种奇特的革命,不声不响,静寂寂地发生着,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百万、千万乃至万万人的思想、行为和整个的人生观。它不曾牵引起内战,阶级斗争和流血;它没有伟大的领袖,没有计划,没有组织,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这种革命只发生在男男女女的床第之间,它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进行着。”<sup>①</sup>

在一个世纪以前,基督教的性伦理在西方大致上广被接纳,不但深植于社会文化,也受到法律保护,例如,当时法律禁止鸡奸、口交、兽奸、尸奸等性行为。西方的性革命何时开始人言人殊,大体来说它在20世纪初已开始酝酿,但翻天覆地的改变则主要源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短短几十年间,性解放的意识形态也由边缘变成主流,人们的性行为大为开放,传统性观念在法制层面更几乎荡然无存。

性革命的发展有赖一群先驱的不懈努力,我们不可低估他们所遇到的阻力之巨大。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Margaret Sanger是美国家庭计划之组织者,她在1922年创办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是Planned Parenthood的前身),大力提倡避孕。

<sup>①</sup> 金耀基:《美国的性革命》,159页。

也有很多一生致力推翻传统性禁忌的“自由战士”，如瑞士心理医生科莱（Auguste Forel）指斥宗教的教条是阻碍人类了解性的大敌；琦尔（Ellen Key, 1849—1926）是瑞典一名女权的捍卫者，她也力主每个人都有寻求性的满足的权利，她认为基督教的卫道之士其实是对丰富多彩的性经验以及人类追求幸福的渴求都存着恐惧感；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更认为传统的婚姻制度令女性在性方面受到男性的剥削；在英国，罗素（Bertrand Russell）、祖特（C.E.M. Joad）和萧伯纳（Bernard Shaw）均公开抨击传统的道德观念，并将所有问题全归咎于基督教的影响；在美国，埃利斯（Albert Ellis）是主张“自由恋爱”的重要倡导者；许多小说家也推波助澜，起来瓦解过往的禁忌，例如劳伦斯（D.H. Lawrence）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学者对性革命意识形态的散播居功至伟，如 Margaret Mead 在 1928 年出版了 *Coming of Age in Samoa*，展现一个没有性压抑的世外桃源。<sup>①</sup>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是心理分析之父，自他提出了利比多（libido）（即性本能）的观念后，人们开始认为性是人类的最基本欲望，若被压制，便会造成神经错乱。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6）可说是“性—政治运动”的先驱，他认为只有通过性解放才能达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他致力维护青少年的性权（他 1932 年出版了《青年的性斗争》），希望消灭家庭和废除性道德——因为这些都是人“性”的枷锁。

性学的发展也是性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金赛（Alfred Kinsey, 1894—1956）应是最有名的性学家，他进行了多方面的

---

<sup>①</sup> 但后来一些人类学家指出，当时 Mead 只是 23 岁的毕业生，在 Samoa 只住了 9 个月，对当地语言了解不多，所以很多资料根本是错的。

研究,以实例数据作性学的基础,他的巨著有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1948) 及 *Sexual Behaviou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均带来极大影响,力证各种各样的性行为都是正常的。马士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庄顺(Virginia Johnson)是金赛的追随者,他们在1966年出版了 *Human Sexual Response*,为现代性学奠下基础。“科学化”的性学使性革命意识形态看起来很客观、很有权威性。如性学家潘绥铭便这样说:“在我们这个巨变的社会中,除了性学……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坐标,以审视、改革和发展我们的性价值观呢?”<sup>①</sup> 在性的问题上,相信科学家总好过那些不科学的“道德佬”吧?

当然性革命还有很多原因,要把它放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洪流中去理解,因为人类的自由和自主是大气候,传统性道德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和不合理的约制。性革命也是世俗化的表现:人对教会的性规条的反叛,代表着“人本主义”对神权的挑战。而在社会民主化的大潮中,道德的“民主化”也易被看做理所当然。这些都是性革命成功的文化背景。

妇女解放与性革命也息息相关。妇女一直是传统性道德的主要支柱,妇女运动为她们争取个人自由后,她们的性需要也得到重新确认,最后性自由更被视为女性自由的最重要元素。传统观念认为女性是没有性欲的,后来有报告指出女性也有性高潮。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女性的性自由。

性解放在过去有三大恐惧:意外成孕(conception)、感染疾病(infection)、奸情识破(detection),但是避孕方法的普及(如美国的FDA在1960年准许避孕丸)和堕胎合法,令受孕的威胁大减。抗生素的发明消除了第二项威胁(这在后来证明是幻

<sup>①</sup> 潘绥铭:《性学专题:中国性现状》,49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觉)，而社会的现代化和都市化则大大削弱了第三项威胁。

最后当然不能不提大众传媒的急速发展，电视时代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来临，自此大众传媒往往充斥着性的描绘，成为性革命意识的载体。再加上商业社会的逻辑，色情文化可说势如破竹。总而言之，当外在约束去除、内在的道德规范被否定、个人自由被歌颂后，还有什么可“阻碍”人无拘无束地表达他从“盘古初开”已有的性欲呢？性革命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索罗金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提出他对性革命的批判，距今已差不多半个世纪，当时性革命还在初期，在这段期间它又有了很大的发展，那索罗金的批评是否过时了呢？没有，索罗金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很准确地把握到性革命的弊病，而这些弊病的后果今天更清楚地展现。

### 三、索罗金眼中的性革命

性革命的具体呈现就是文化的泛性化，在每一个层面性爱的描述和性放纵的意识形态都尽占主导地位。“十八、十九世纪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平凡单调，但也通常是合理合法的性爱，到了前几年已为一些异常的……形态所代替……性爱、性欲和性高潮被加以装饰和调味，以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姿态跃现在纸张上。”（24 页）“低级刊物以细致的手法刻绘种种的性爱途径、栩栩如真的香吻、拥抱和性交镜头，同时蛮酷地使强奸、性变态戏剧化，……总之，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类废料已变为无所不在。”（27 页）这句话香港人应不难明白。

更重要的是性观念的剧变：“十九世纪的大作家，如托尔斯泰或福楼拜，将违理违法的激情视为悲剧的种因……但是，现代文学中的通奸者和他们的罪行，通常都被作者看成是现代男女在

他们单调无趣的生存中一场愉快的历程……甚且被描述为挣脱旧式婚姻枷锁的一种可嘉许的解放方式。”(25页)在其他艺术领域,也有类似的发展。今天我们的绘画、摄影、雕刻和其他视觉艺术,音乐(特别是通俗的音乐)都充满着性的暗示。在索罗金的年代,大众传媒只是在起步,但他已指出影剧和电视对性和罪案的执迷:“我们这个时代的通俗剧集中在四个点上:性之树上奇形怪状的果子,罪犯的藏身所,警察局的陈尸所,以及疯人院里的蛇洞。”(36页)这些观察在今天似乎仍然有效呢!

性革命的浪潮也直卷科学,如人类学家便经常“以详实、生动的笔调描绘原始土著的性生活,同时笔尖时而流露对性自由由衷的激赏”,他们甚至“赞颂杂交,推荐婚前及婚外性关系”(39页)。在精神病学里,弗洛伊德提出人们被无可抗拒的性本能驱策。这种人被索罗金嘲讽为“弗洛伊德动物”,他也认为:“性执迷的现象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风行,两者可说是互为因果。”(41页)

性革命的冲击也导致婚姻制度的松弛:“离婚的条件和手续越来越简便,……新近的法规也大大消除了离婚者再婚的障碍。……公众的干预更进一步闯入不容违逆的家庭堡垒之中,使得官方的控制加强,而削弱了父母的威权——总之,造成了家庭制度的‘国家化’。”(45~46页)索罗金提及的趋势在这半个世纪都不断加剧。

性革命的影响在政治舞台上也可看到:“在二十世纪之前,离婚、遗弃或生活不检点是通往政坛高职莫大的障碍,……今日,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物之中性开放主义者比比皆是。”若索罗金亲眼见证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他可能会活活气死呢!总而言之,“性执迷的现象,已泛滥到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它不



断地轰炸着我们，从摇篮到坟墓，从我们生存空间的每一个点，并跟随着我们活动、感觉、思想的每一个脚步。我们可以躲过春宫文学，但我们可能逃不过那些摇摆身躯、低声吟哦的歌手，逃不过新心理学、社会学，和弗洛伊德化了的宗教，逃不过电视收音机的娱乐节目。我们已为性的大军所团团包围，除非我们能修炼出一种内心的免疫，我们是注定要被它征服的”（50页）。

但这种“内心的免疫”已变得愈来愈困难了，因为盛行的享乐主义把性放纵合理化：“节制、贞洁、忠实是违反理性的，应当受到斥责，因为它们剥夺了我们的快乐……一切的性关系在道德上都是好的，不管那是合法的或非法的，正常的或异常的，也不管对象是个妓女或男妓。……人们有随时随地享受性交之乐的权利。”（42页）这带来道德的颠倒：“许多旧日的美德，诸如自制、守贞和忠实，已被视为怪事，仿佛是史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化石一般。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之下，罪恶感和懊悔的情绪甚至被宣称为性压抑的危险症候。……往日的败德，今日被视为道德的进步和新自由的觉醒。”（43页）索罗金指出社会正朝着无道德（amoral）境界进发，今天西方社会仍向着这方向走，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亦步亦趋。

性革命带来的最深刻改变，是人类的自我理解，“智人”已被“性人”取代：“性驱力现在被宣称是人类行为最具活力的主要动机。最充分的性满足，现在披上科学的外衣，被认为是人类健康与幸福的必要条件。性压抑被认为是心理挫折、精神病和犯罪的主要根源。贞洁被讥笑为一种矫揉造作的迷信；婚姻的忠诚被污蔑成一种古板的伪善。父亲被描绘成一个嫉妒的暴君，渴望阉割他的孩子……儿女各自充满了引诱父母的‘情结’……‘智人’（homo sapiens）变成一种拥有生殖欲、肛门感、口腔欲与接触欲的‘性人’（homo sexualis）。以往，人类被认为是按照神的

样子所创造的‘神子’，现在却变成一种被性本能所左右的性机器。”(19页)很多知识分子歌颂这种改变，认为是人类的解放，然而索罗金却认为这种改变不单贬低人类的尊严，更是祸害之源。我在下面介绍索罗金对性革命的批判。

#### 四、性放纵扭曲个体的行为动力系统

性革命分子通常认为性行为模式的改变不会对整体人格有什么影响，纵使有影响也只会是正面的。索罗金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当人“投身到这个色情化的环境中，自小没有受到‘你必须怎样’、‘你必不可以怎样’的道德强制训练，越来越多的青年和成人依循本能欲望的轨道，随时随地，只要有机会，就寻求满足他们那不受遏抑的冲动。”(51页)不是每个人都会变成罪犯，但“一个人若致力求性的愉悦，那么，在决定他的整个行为的各种因素中，性欲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这就好像改变一部车子的引擎和发动机。……个人的整个人格、心灵、价值及行为都会改变。”(16~17页)如果抗衡的心理机制软弱无力，这些心理因素就会追求更混乱的性自由。

性放纵也会破坏道德的完整性，例如滥交者必须欺骗他的伴侣或双亲。这样便会破坏了配偶之间的誓约及亲人之间的信任，也“动摇了他人格所依赖的整个道德基础，这个基础就像一张蜘蛛网：如果你破坏这个网络的某一焦点，你将危及，甚至毁灭整个网络。”(68页)

#### 五、性放纵对个人及其亲友有坏影响

性革命的意识形态认为，性自由的社会比性压抑的社会更健

康、更幸福。索罗金指斥这些看法是无稽之谈。<sup>①</sup>

### （一）性放纵对身体健康有不良影响

从历史上看，放荡者很少长命。因为“人体所贮存的全部精力是有限的；……每一性行为都要消耗一些生理方面的活力。当性行为过多时，我们整个机体便开始衰败下去，而放荡将造成肉体的衰弱，或者其他种类的无能与缺失，诸如性病与酒精中毒。”（55页）索罗金研究了332个君王及3090个基督教圣者的寿命后发现，君王过多的性行为是缩短他们生命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说，圣者则更长寿。比较不同群体的历史名人，“最贞洁的群体（教皇、神学家、僧侣、隐士、神职人员）最长寿。相反的，较放浪的（bohemian）诗人、音乐家、画家等其平均寿命（64岁~64.4岁），仅高于最短寿的君王。”（59页）

### （二）性放纵对心理健康有坏影响

索罗金认为，就“健全的人格而言，‘较高等的自我’（higher self）以道德和美学的价值来控制较低的‘自我’（ego）和动物性驱力。……这种人获得了心灵的平静”（62页）。对比起来，“放荡者的内在世界与行为，呈现一片混乱。欲望主宰他的思想和感觉”，他内蕴各种“紧张与冲突，包括：他的生物性驱力的彼此对立，特别是强烈的性驱力与其他驱力的对立；各种价值与动机之间，以及价值与性驱力之间的不调和”（62~63页）。因

---

<sup>①</sup> 例如索罗金质疑金赛（Kinsey）的统计资料的有效性，这怀疑被很多当代学者印证了：金赛调查了5300名男士，但这个样本的代表性很成疑问，因里面有大量性罪犯、囚犯、男妓等，而且金赛有嫌疑性侵犯一些婴孩。参见 Judith Reisman, “Kinsey and the Homosexual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Carrollton, Tex.: Lewis and Stanley, 1996, p.21。

此,“只要发生一点最轻微的不幸事件,便能促使他那失调人格一连串的改变。……甚至造成精神病”(63页)。假如弗洛伊德是正确的,则社会中的成员提高性自由,应该减少心理机能的失调。然而精神病人却越来越多:“在美国,现在的人口数是1880年的两倍,但是目前在精神病院的病人,却是1880年的12倍。……有25%至50%的成年人,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病。”(65页)当然“不应该以性自由作为当代精神病的惟一原因”,但“也不能辩称,性自由的增加;以及心理分析的理论和应用,已经减少心理失调的蔓延”(66页)。

### (三) 性放纵削弱个体的创造力

性革命分子爱列举一些性开放的艺术家的例子,作为性解放的例证。然而索罗金认为:“至今仍无人已证明这些天才或其他任何天才,是因为他们性放荡才变成创作者的,……相反的,这些天才中,有些人由于他们性生活的不正常,而使他们早夭,或受到严重的伤害。”(69页)如舒伯特、奥维德、普希金、莱蒙托夫、王尔德等。

回顾历史,“绝大多数有创造力的天才,他们的性行为若非极为正常,便是实行禁欲或半禁欲”。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普罗蒂诺斯(Plotinus)、阿基米德、赫希俄德(Hesiod)、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瓦尔罗(Varro)、哥白尼、牛顿、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维多利亚(Victoria)、巴哈、但丁、贝多芬、康德(Kant)”(70页)等。“任何著名的成就,需要长期的训练。”(71页)将没获得满足的性驱力转化为创造成就的形式,反而是很多学者和科学家的成功之道。

#### (四) 性放纵会伤害家庭和亲友

性放纵者不但伤害自己，往往也会影响别人：“性冲动的过分放纵，将会逐渐伤害人的身心健康及其生命力，破坏他的道德，或给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带来不幸和耻辱，削减他的创造力，毁灭他对幸福的憧憬。”（53页）

说到底，性放纵者往往得不到幸福：“放荡者愈是企图去追求愉悦，他便愈无法成功。曾经令他兴奋的感觉将变成单调、乏味，甚至痛苦。这种趣味剧减的趋势，有时反过来促使性贪婪者去寻求反常的刺激，而这更加剧了病痛和不幸。……生命最后成为一种可怜的存在，而常以自杀来收场。”<sup>①</sup>（74页）

## 六、性混乱对社会与文化有坏影响

### (一) 性革命冲击婚姻制度

在索罗金的时代已有不少数据显示性革命会冲击婚姻制度。“在1870年，每33.7对婚姻中，有一对离婚；在过去几年，每2.5对到3对婚姻中，就有一对离婚。”（8页）“混乱的婚姻正在增加，……1890年以前出生的男性，婚前仍维持贞洁的，占65%，但是1910年以后出生的男性，却降至18%。至于女性（婚前仍维持贞洁）的比率，则由85%降至32%。”（14~15页）“由于离婚、分居与遗弃的数目正在增加，使得四五千万的美国孩童中，有一千二百万人没跟双亲一起生活。……剥夺了安全感

---

<sup>①</sup> 索罗金这里谈的可扩展到享乐主义文化，越执意追求快乐，越难感到快乐。最近一个对亚洲青少年的调查印证了这点：在享乐主义文化最发达的香港，只有5%青少年说自己是快乐的；而在菲律宾，则超过70%！

和爱,并且被迫置身于半个家长或没有家长的严酷家庭里。”(9页)“1927年,每1000个活胎,有28个是私生子;……1947年已达到48.7个。”(15页)索罗金预测:“贞操的观念在数代之间,将变成过去的神话。而目前这种婚外性关系的增加,也将迫使一夫一妻的婚姻,被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或无秩序的婚姻,或一种‘自治的’假婚姻所取代。”(15页)这个预言的前半部分差不多已实现了,至于后半部分,一夫一妻制今天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香港已有一些学者(如吴敏伦、何式凝)提倡“多元化婚姻”——即是说多少男多少女都可一起“共结连理”。

现代社会把性和婚姻私人化,所以对以上改变掉以恒心。然而索罗金相信结婚不只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社群的生存和幸福:“婚姻行为的任何重大改变,任何增加性的纷乱和不法关系的行为,都包含重大的后果。性革命……动摇了整个社群。”(8页)为何如此呢?因为婚姻制度有多种重要的社会功能:

(1) 婚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婚姻乃是个人生理、心灵、情绪、精神及其成熟素养的社会性表现。婚姻使一个男孩成为丈夫及父亲,使一个女孩成为妻子及母亲。”(4~5页)

(2) 婚姻使男和女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婚姻是肉体、心灵与精神最需要、最亲密、最完全的融合,融合成一个被社会容许,而无法分割的‘我们’。……某一方的欢乐和悲愁,变成对方的欢乐和悲愁。他们的一切价值、期待及生活经验,彼此完全分享。彼此无条件向对方保证忠诚,直到死亡拆开他们。”(5页)所以家庭使夫妇的道德情操高尚,是发展爱情、表达爱情的最佳及最尊贵的方式。

(3) 家庭是孩子获得社会化的最佳地方:“家庭是使新生儿获得知识,让婴儿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格的最重要场所。”(5页)

(4) 婚姻和家庭生活能激发人的潜能：“互爱的培养，以及教育子女的工作，都会激发夫妇最佳的创造力。”（5页）“婚姻是发展每个人的创造潜能的最普遍、最平等的途径。”（6页）

(5) 家庭制度确保社会和文化的传承：“通过婚姻，他们使自己、祖先们及他们的社群，得到一种社会性的不朽。他们将自己的姓氏，价值、传统及生活方式传给他们的后代。”（6页）

索罗金不是单纯地批评放纵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他更指出不法的性关系根本不能完成上述那些工作：娼妓和“一切偶然的‘爱侣’……都不能算是心灵或道德上的结合……这类关系乃是一种罪恶，或是一种为人父母的道德堕落及社会腐化的征兆。……双方为了满足性欲……自我并没融成一个‘我们’，他们的自私也没有被相互献身、相互爱恋所减轻。为了短暂的性快感，……双方长期地陷入于懊恼、焦虑、恐惧、后悔、怨恨和痛苦中”（6~7页）。“这些私通的行为，也不是双方道德、心灵和社会教育的理想方式，反而常常导致道德堕落、不负责任、心理失调、罪恶，因此，无法促使创造潜能的发挥。”（7页）再者，随便的性行为“并不能从事生殖，决定后代性格，此一重要工作，也无法使父母获得不朽”（7页）。“万一他们生下小孩，这些婴儿将蒙上‘私生子’的污名。这些婴儿乃是兽欲和人类愚行的牺牲品。”（7页）

然而因为爱心是家庭和婴儿的摇篮，所以家庭的破裂意味着：“不自私的关怀与自发性的助人的本原正渐渐干涸……这样的社会将愈来愈多自我主义者，……我们这时代一些无休止的冲突的原因之一，乃是父母爱的衰减。”（13页）索罗金当年已指出“愈来愈多被父母遗弃的孩童”（13页），这趋势在今天香港的多次家庭惨剧中表露无遗：父母不单遗弃孩子，更要他们陪葬！

## (二) 性混乱会使社群衰弱

索罗金认为性混乱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使它愈来愈无法抗拒各种打击。从生理的角度看,“假如性混乱者的人数,达到一可观的比率,这些人终将摧毁这个社会。……性病蔓延于那些不谙防治这些传染病的团体间”(77页)。性放纵对社会的坏影响有时以较间接的方式出现。

首先,性放纵者往往对孩子没有兴趣,通过避孕或堕胎,他们的生殖率会偏低,再加上性病、流产,以及其他混乱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许多淫荡者无法生育。“生殖率与死亡率都低的结果,便是老人群不成比例的增加……上了年纪的人是无法取代年轻人的活力、干劲、勇气、冒险精神、韧性、创造力。一个充满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国家,将在生理方面、心灵方面、社会方面,削弱自己的国力。”(82~83页)

性放纵既然对个体的心灵、情绪和意志有伤害,当这种情况渐渐普及时,整个社会自然会受影响。“性生活都紊乱无序时,则精神病、喜怒无常、意志软弱的现象便开始增加。……社会将逐渐无法控制种种生物的和情绪的驱动力;无法抗拒新奇的和物质享受的诱惑;无法克制权力欲;无法去完成艰困的义务;无法做必要的牺牲;也无法规划并遵行自己的历史历程。这个社会将从一个自决、自制的集体,堕落成一个无力抵抗的漂流物,直到它被冲抵历史瀑布的边缘。”(84页)以上的描述相当吻合香港社会的发展趋势。

## (三) 性放纵会削弱社会伦理

不可忘记,性放纵者大多“是自私的虚无主义者,以追求愉悦为职志”,“每个人认为自己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凭自己的喜好



篡改所有的道德与法律标准。……社会失去它内部的团结，也失掉了该社会的幸福所必需的公德”（89～90页）。性革命“破坏神圣与世俗的法律，粉碎一切价值。……摧毁了正常爱情中的真正自由；丰饶而高贵的性欲被贬抑成纯粹交媾的行为。……人类……变成性欲的奴隶”（90～91页）。这种社会贬低了人，贬低了母性与父性、婚姻与爱本身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中，无人是安稳的。而且市中心比野外更有此危险。

更严重的是，性革命分子往往用犬儒的态度看待社会道德，他们认为文化价值“只是为了供奉性驱力的一种装饰品。社会制度只是为了充分满足性本能而设的。人类的历史被描绘成一种由性所控制的过程。……淫逸者便以他们能从‘不科学’的禁忌与道德的滥调解脱出来，而洋洋自得”（92页）。这种观点在社会规范牢不可破的时期，或许真的有解放的功能，但随着社会一步步自由化，便会塑造一种广泛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人们对社会建制失去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经济的与社会的控制力也开始瓦解。法律的威信，以及现存制度的受尊敬程度，开始下降。……强权成为真理”（92页）。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生活的水准降低，经济发展缓慢，经济上的创造力凋萎。”（93页）

此外，社会伦理的崩溃往往可从青少年问题的恶化上反映出来。“青少年犯罪率高，其淫乱的程度令人惊骇，他们的某些行为简直是愚蠢、残酷，这些现象其实只是文化混乱的必然结果，因为他们就是生于此种文化中。”（143页）“少年犯的罪行，既非由贫穷，亦非由无知所促成。他们的动机纯是顽皮，或因犬儒思想（Cynicism）、淫逸，或为了刺激而作孽——所有这些无视纪律的动机，乃是从一个世风败坏的环境里培养出来的。”（144页）索罗金多年前写的这段话在今天的社会已应验了，但可能连

他也想不到,青少年学生会带枪支回学校扫射师友,以至今天很多美国的校园人口都要安装金属探测器,像机场要防范恐怖分子一般。而今天在英国的中小学,要有驻校警察,才可解决校园的纪律问题!

#### (四) 历史例证

索罗金以两个命题总结他对婚姻制度/性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看法:

1. 在社会所尊崇的婚姻制度里,才得有性生活,道德上鄙斥婚前和婚外的性关系,法律也禁止这类关系。在这样的国度比那种性关系混乱的国度,更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成长。

2. “在一个允许长期纵欲,允许不法而又混乱的性行为国度里,文化的创造力将会衰退。”(110页)

索罗金相信历史的证据是支持这个命题的:“历史上许多社会,当它们处在性混乱的时期,常有内部骚乱与对外战争的现象。……在革命和国际冲突的时期,性解放常有显著的增加。性混乱与政治社会的动乱是孪生的恶魔。”(93页)有好些历史佐证。

第一,“当古埃及这出伟大的历史剧演至最后一幕时,对诸神与永恒的信仰已日趋式微。性混乱常以极端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广及群众。性变态的增加之外,无耻的杂交现象也大量增加”(95页)。

第二,罗马帝国的灭亡到基督教的兴起:“性混乱与社会、政治的动乱,仍继续腐蚀罗马文化、社会和罗马帝国主要的感情形式,并使得这一切步向无法抗拒的崩溃之途。基督教……禁止男女形态淫荡,宣称一切婚前的性关系是罪恶的,赞扬性的贞洁与坚忍”,便“抑制性混乱的流行,恢复了婚姻和家庭的神圣,

再度使性行为正常化”（100页）。这样，西方文化慢慢恢复，及最后结出奇葩。基督教“证明自己是解救罗马世界大灾难的惟一方法，也是惟一能遏止罗马人败德的道德与精神力量”（135页）。

温敏（J.D.Unwin）曾比较文化与社会组织较进步与较不进步的初民社会，比较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在其成长时期与衰落时期的差异。<sup>①</sup>索罗金根据这些人类学研究指出，“较进步或较富创力的初民社会，比起较原始或较缺乏创造力的社会，更会克制、更会调和其性生活。……在他们文化与社会成长的时期，该国度的性生活差不多都是处于一个非常调和的状态下，而当他们衰落时，性混乱的情况便很显著。”（111页）那些长期维持严格性生活规律的文明社会，都达到高度的文化层次。“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以较散漫的两性习俗取代较严格的习俗，而仍保持其高度的文化层次的。因此，当基督教的影响使条顿族的（Teutonic）部落性自由受到限制时，这里限制乃是促使条顿部落日后文化进步的最重要动力之一。”（114~115页）“巴比伦人、埃及人、雅典人、罗马人、早期的阿拉伯人，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他们社会扩展、文化成长的初期，都有一套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限制性行为，使得这样的社会聚积了无数的活力，而将之投入创新、成长的工作行列……因此，这样的社会能够有力地扩展，并以惊人的能力抵御外侮。”（116页）

“一旦统治集团与整个社会都放松它的规律，则在三代之内，文化便会没落下去，例如：巴比伦、波斯、马其顿、蒙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后期，以及埃及古王朝、中王朝、新帝国的末期和托勒密王（Ptolemaic）时代。”（115页）性自由“不断扩展……

<sup>①</sup> 参见 J.D.Unwin, *Sex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性关系的严格规律，便被逐渐散漫的规律所取代。……创造力开始衰落。……较年轻的那几代需要时间来‘学习’新的行为模式。此后，衰落的现象便与性自由的扩展携手而行了”（116～117 页）。例如，温敏发现，“由于自动放松对性的戒律，衰落的现象也发生于阿兹特克人（Aztecs）、阿善提人（Ashanti）、美洲印第安人，以及另外大约十个……社会”（120～121 页）。

概略而言，“在二百五十个未开化或低度开化的社会中，有百分之七十允许相当程度的婚前性行为自由。……这些自由可能是这些社会仍停留在原始状况，而无法创造伟大文化的原因”（171 页）。“半原始种族，在这向上的路途中，通常都是禁止婚前或婚外性关系的。”（172 页）

在当代，苏俄的经验也印证了以上观点：“自由做爱（free love）受到官方‘一杯水’（glass of water）理论的推崇：如果某人口渴……他用什么杯子取水解渴都没什么要紧；同样的，他如何满足其性饥渴，也没什么要紧。……法律，只提到男、女双方为了满足其欲望而‘订盟’（contract）；至于维持‘盟约’的时间，……可以是……一年、一个月、一周，甚至只有一夜。一个人可以任意结婚、离婚多次。……‘结婚’甚至不必去登记。重婚或多婚……被认可……公立医院施行堕胎手术。……婚外的性关系被认为是正常的。”（115～116 页）“几年之内，一大群野孩子变成了苏俄的真正威胁。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少女，被毁了；离婚和堕胎急剧增加。多婚制度下的夫妻，彼此间的怨恨与冲突迅速增高，心理失常的人数也快速增加。国营工厂的工作情况怠惰不堪。……整个结果是那么骇人，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宣布‘一杯水’理论是反革命的，不得再加以宣传，官方重新推崇婚前的贞洁与婚姻的神圣。”（118～119 页）回顾整个过程：“从 1918 年到 1926 年，当性自由受到鼓励时，苏维埃政府

简直就是无能，俄国无法在积极的重建工作上获得太多的成就，也无法推动文化的成长。”（119页）“1930年以后，当遏制性自由的工作大致完成时，政府无能的情况开始了转机，建设工作获得动力。工业化与经济成长，学校、医院、研究机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兴起。”（119~120页）

### （五）性放纵削弱整体文化的创造力

索罗金相信，人类“有一种潜藏的创造动力存在着。如果每个人和团体，长期沉迷于性的活动，他们便将这种力耗费于最鄙俗的方式上，无法推动文化与社会的创新。如果他们的性行为有所节制，他们就保留了更多的动力以完成其他更崇高的目的”（124页）。

当然，索罗金承认过分严格地限制性冲动，也未必对文化的创造力有利，然而“如果性自由继续扩展，甚至变成混乱的状况，那么，30年至60年以后，团体的整个创造力将趋于没落，特别是有关宗教、哲学、伦理学、法律诸方面。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艺术方面，创造力也许还能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但是这几方面的创造力，最后亦将没落、灭亡”（126~127页）。索罗金认为，在宗教、哲学与伦理学方面，美国的创造力实在乏善可陈：“我们这时代充满许多饱学的思想传授者，他们能够吸收各种哲学的学说，却无法树立权威。”（148~149页）“更危险的是，我国缺乏道德方面的创建。没有崇高的道德先知，也没有被我们所接受的使徒（具有高尚爱心的使徒），没有美国的甘地……史怀哲……圣方济……作为我们道德上的典范。”（149页）

道德创造力的衰落，使社会趋向相对主义。“现代人都接受

‘强权即公理’的观念，认为‘如果逃避惩罚，则任何事都可以做’……因此，世界大战、无休止的革命、犯罪与混乱接踵而至。也因此，人际间、团体间，充满了无数的冲突与紧张。……将我们从道德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反而使我们去崇拜权力。”(151页)

## 七、性放纵扰乱了健全的性秩序

索罗金对性革命存否定的态度，他所推动的是整体文化的转化：我们必须重估性在我们的整个人和生命价值上所占的地位，第一要做的就是重整我们的自我理解。

### (一) 完全的人

首先，我们要确立人的尊严。索罗金深信：“人乃是有理性有知觉的心灵的具体显现，是宇宙间那至高的、超乎理知的创造力……的参与者。借由人的有机组织和机械组织，人成为理知的存在和超理知的‘与上帝同形的上帝之子’。脑子和其他的器官只是人的工具‘真理’的思想者和发现者，至高之‘善’的追寻者，崇高之‘美’的赞赏者，以及伟大价值观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总之，是用来为磅礴于之人体内里的永生之‘我’服务的。这种对于‘全人’的概念应被用以取代把人当机械或有机体的错误观念。”(161页)

此外，我们要重新肯定人的自由和自我超越的能力。“第二种需要去除的错误信念，是以为人的行为完全由他的本能欲望、本能反应、兽性的冲动（包括性）和环境所控制的观念。”(161页)“目前流行的信念——即饥饿、口渴、痛苦、快乐和性欲对人有‘全能’的控制力——可以说大致是一种以讹传讹的神话，没

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徒使人道德低落和美感丧失罢了。”（162～163页）有尊严、有自由和自我超越能力的人才是完全的人。

## （二）完全的爱

性革命把人变为性欲的玩物，然而站在“完全的人”的角度看，“我们要将性爱视为男女间‘完全之爱’的一部分，不仅要爱肉体，更要爱对方的灵魂、心智和完整的个性。这种完全之爱……不能贬抑它，以为它是随便跟一个散发着性魅力的陌生人就可以完成的陈腐玩意儿。……这完全之爱是一项幸福的恩宠，同时它也是对被爱者——家人、友人、社会和一般人类——的一种‘神圣的义务’。如果它堕落成纯然的乱交关系，它必丧失它的福分，它的圣洁和它的价值。如此它就变成类似妓女和嫖客之间的性交，并使‘情人们’堕落成了可悯的催淫者”（164页）。提倡完全的爱，“其目的并非在于压抑此一人生的大乐，而只是要避免使之沦于虚伪、堕落和误用”（163页）。

## （三）完全之爱对青年的要求

索罗金不赞成婚前性行为，他劝导婚前的青年将全副精力放在发展他们的生理、心理、道德和超知觉的潜力之上，尤其要集中心力培育他们的特殊天分。只要青年内在化了对完全之爱的专注，就能“有效地以一种最为优雅的方式防止危险的婚前性行为”（166～167页）。

索罗金预期到了这样的批评：“青年对于性的严厉节制是不健康的，你那一套理论只不过是古老、不科学的奇谈。”然而他认为上述说法“只是大致吻合于那些在遗传上有缺陷，或受了上述谬误的理论误导的人们情况罢了”。他反驳道：“尚无人证明婴儿已为性欲所折磨”，也“尚无人证明儿童和青年有任何弗洛

伊德‘情结’——‘伊底帕斯情结’，‘纳雪瑟斯情结’，‘塔特纳斯(Tetanus)情结’，‘阳物嫉妒’，‘阉割恐惧’，等等。……只有在那些受了谬误、败德的教养的青年和儿童身上，才有这些东西的痕迹”(168~169页)。

此外，尚无人证明非法性欲的禁止会导致下意识的压抑，并迟早会以心理或生理病的形式爆发出来：“十九、十八、十七世纪的那些实行婚前禁欲的青年比今日更为普遍，然而我们找不出证据说上几个世纪患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今日多。事实上，我们有理由可以推论今日美国患心理疾病的人反而远比上几个世纪多。如果这些弗洛伊德奇谈正确，几乎所有的人类岂不老早就都疯光了。”(171页)

#### (四) 婚姻

在婚姻之中，性爱自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性爱绝非婚姻幸福与否的惟一标准。索罗金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只是对那些以食为生，将生命奉献给口腹之乐的暴食者和饕餮者而言，食物的每一项细节均有不合理的重要性。暴食者对吃的执迷可说是一种幼稚病，而饕餮者对食物之爱的献身亦是病态异常的症候。对一个正常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全心贯注于创造工作的人们，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就够了；他不会愿意花费时间或创造性的精力在追寻饕餮者对食物的挑剔上。”(176页)性饕餮者的癖也相仿：“他们将生命奉献于性快感的追寻上，他们专注于性交的细节，他们不断地找寻各种正常的、异常的性刺激，他们赋予性器官的组织及作用和挑起性欲的技巧之解剖学上的细节以非凡的重要性，……这种种现象较口腹饕餮者的执迷实更为幼稚和病态……人格不全，人生视野狭隘……反而……使得他们性无能，以至于不得不拼命找寻新的性刺激。……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他们的性



关系就会变得沉闷而无趣。”（176页）

索罗金警告说：若为性执迷所感染，“而且又把性爱看作是婚姻生活最主要的一部分，其结果是这些常常一步步，转而沉溺于婚外的性关系之中，因为他们抗拒不了性的诱惑”（177页）。这又似乎说中了很多现代社会的婚姻的弊病。

## 八、反思索罗金对性革命的批判

索罗金的观点当然不无可商榷之处，他完全着眼于性革命中较极端的主张，或许会忽略了性革命的一些合理主张，及其所带来的好处。<sup>①</sup> 我相信性革命是对人类文明不无贡献的，它使我们对性不再讳莫如深，透过性学的发展，使我们对性有更实事求是的认识。它有助打破一些不需要的性规范，促进性自由和男女平等。特别在性文化极度保守的地方，某种程度的性革命或许是需要。又或许“他对弗洛伊德的批评……不完全公平。”<sup>②</sup> 例如我们可指出弗洛伊德虽然相信人内心最基本的驱动力是性，但他自己并没有提倡全无边界的性自由，相反，他相信一定程度的道德规范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是文明不能不付的代价。<sup>③</sup>

然而整体来说，索罗金的确抓到性革命的关键所在，他的批评也击中性革命的要害：首先，性放纵会扭曲个体的行为动力系统，削弱社会伦理和整体文化的创造力。长此下去，这导致各种不良后果，于个人健康和寿命、心理健康和个体的创造力都有坏

---

① 参见 J.Rinzema, *The Sexual Revolutio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Belfast: Christian Journals Limited, 1972。该书对性革命有较正面的评价。

② 金耀基：《美国的性革命》，175页。

③ 但不少普及和利用弗洛伊德的思想的人，所提倡的可能就正如索罗金所说的一样。

影响,也会冲击婚姻制度、腐蚀社会文化,使社群衰弱。性革命的哲学含义是激进的,纵使性革命者本身温和,但当那种思想被普及,再加上世俗社会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商业挂帅等大潮流的推动,性放纵似乎是性革命难以避免的后果。批评者可能会反驳:“把少部分历史资料应用到当代处境是不一定准确的。”(其实索罗金已引用早期性革命的后果的数据。)但进一步累积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数据显示,索罗金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以美国为例,性革命对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sup>①</sup>:离婚率比1970年代以前增加了两倍多。在1960年,每100个女子,就有73.5个结婚和9.2个离婚,1990年的数字是55.7个结婚和21个离婚;与有离异的父母同住的孩子的比率:2.1%(1960)和9.5%(1990);单亲家庭的孩子(九成是无父亲的)的比率:1990年的数字是1960年的3倍;私生子:5.3%(1960)和28%(1990),增加了4倍多!

青少年的性行为也大量增加。有性经验的15岁女童的比率:4.6%(1970),25.6%(1990)。有性经验的19岁女童:48.2%(1970),75.3%(1990)。如索罗金所预料,贞操在青年人中已成为“稀世奇珍”,随之而来的未婚妈妈、堕胎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

罪案率在这几十年也急升。暴力罪案(谋杀、强奸、抢劫、袭击)(以每10万美国人计算):16.1件(1960);36.4件(1970);在这期间,所有罪案的数字由340万升至810万。暴力罪案的数目在1975年超过100万,在1992年已到达200万(罪

<sup>①</sup> 以下数字参考了几份资料,包括Graham Heath, *The Illusory Freedom: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Medical Books Ltd., 1978; William Murchison, *Reclaiming Morality in America*, Nashville, Atlanta: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4。

案的总数字是1 440万)。在这期间，人口增长了41%，但暴力罪案升幅超过5倍，整体罪案数字增加了3倍。在1992年，有23 760名美国人被谋杀（这是1900年的数字的100倍多），有109 062名妇女被强奸。监犯的数目自1960年到1991年也增加了4倍。很多人会说罪案的增加完全是经济的原因，与文化无关，但我们可与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那时的失业率高达25%）比较一下。拘捕的数目（以总人口的比率算）的确由1933年的0.25%升至1941年的0.47%，然而1949年时经济相当蓬勃，但比率仍上升至0.53%，而在1990年达到4.5%——虽然整体来说美国的经济在这段时期是有增长的。

总的来说，自1960年的30年来，社会文化有如此改变：暴力罪案增加了560%；私生子多了不止400%；离婚率增加4倍；生活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比率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杀率增加超过2倍。

性革命前，只有两种性病是常见的：梅毒（syphilis）和淋病（gonorrhoea），但今天性病广泛蔓延。以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为例，在美国的 Rutgers 大学，60%有性行为的女生在三年内有感染。由此产生的癌症每年导致5 000名女性死亡，而可治疗的也会变成不育。此外白人青少年感染生殖器疱疹（Genital Herpes）的比率近20年增加了5倍，有46%的12岁以上的黑人和20%的美国人感染这种性病。6%~10%有性行为的青少年感染 Chlamydia Genital Infection，患这种病的女性没有可察的病征，若不治疗，会导致不孕。艾滋病（HIV/AIDS）的威胁更是众所周知的，已有40万美国人因此死亡，另外有56万带菌者。

性强暴的问题也严重多了，很多青少年男生认为只要请女孩吃饭，就有权强逼她们发生关系，因此有20%的女大学生曾被

强逼与人发生性行为,且很多例是诱奸 (date rape)。<sup>①</sup> 强奸数字整体来说是上升的,如在英国的威尔士,从1963年到1973年增加了1倍,在伦敦是3倍。<sup>②</sup> 性革命的种种问题也带来沉重的经济代价,据估计,为此英国和美国政府每年分别花费92亿英镑和830亿美元(如表所示)。

	英国政府每年花费 (亿英镑)	美国政府每年花费 (亿美元)
疾病和死亡	10	190
离婚/分居/分手	51	370
家庭破裂	6	40
青少年罪行	14	150
单亲家庭	11	80
总数	92	830

资料来源: Patrick Dixon, *The Rising Price of Love: The True Costs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5.

## 九、结语: 中国需要性革命吗?

面对性革命的种种恶果,在西方传统的力量也有反扑,有些政治家主张重归一些“基本的原则”,教会在社会层面提倡贞洁生活,如在美国1993年的真爱运动(True Love Waits)和1994年的“对性爱的尊重”运动(Sex Respect),少年人的反应也不俗。所以有一种回归“家庭价值”的趋势,甚至有“性革命”已完结的说法。这并不表示抗争已经结束,性解放派仍操纵着大部

① 我们也要注意,少年妈妈的男伴平均来说比她们大6岁,她们真的是完全自愿,还是有被诱惑甚或胁迫的成分?

② 常被提及的丹麦例子不单是例外,其数据更有很多问题。

分大学和传媒，他们与保守分子的争持便产生了一场文化战争。特别是在美国，文化保守主义有一定生存空间，然而性解放仍方兴未艾。

亚洲国家通常对西方的文化亦步亦趋，如香港在近十年也展开一场性革命：同性恋合法化、色情文化泛滥、青少年价值观（特别是性观念）的改变、家庭制度的解体、同性恋运动走向主流、提倡性解放的知识分子愈来愈多、激进妇女解放思想开始涌现等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的“性革命”还是在萌芽阶段，如中国性学家潘绥铭这样说：“笔者也不敢宣称中国性革命已经到来，但它的先声或序幕就是上述新现象，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中国性文化如何发展，绝不是‘必然’或‘应该’如何，而是我们每个人和我们民族选择什么。”<sup>①</sup>

我们要决定怎样选择之前，似乎也应回顾西方性革命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我有三点感想。第一，很多人认为性道德是完全私人的东西，是社会和政府不应过问的。孤立地从每个性行为看，这讲法好像有点道理，但若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西方性革命的后果告诉我们，性道德和性文化的改变对社会有深远影响，不应掉以轻心。第二，“性道德”往往被描绘成压逼人的罪魁祸首，但当我们明白性解放也产生很多受害者，或者我们应重新思考，性道德是否也有保护的功能呢？第三，性革命的燎原之势清楚地显示，性道德（和对任何欲望的限制）易拆难建，今天对“保守”性道德嗤之以鼻的人是否太轻率和低估了道德传统的智慧呢？索罗金对性革命的批判纵或有不全面的地方，但起码提醒我们：“从情欲播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性革命的一些极端思想，在西方已带来沉重的社会代价，我们是否一定要步西方社

<sup>①</sup> 潘绥铭：《性学专题：中国性现状》，552页。

会的后尘,然后才懂反省呢?<sup>①</sup> 我们是否应该思考索罗金的理想,并尝试重建人类的尊严和对完全的爱信念?在这里,基督教思想对索罗金的影响可说最明显了,基督教信仰所衍生的性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否可行?对我们又有什么启迪?这些问题都要留待将来进一步探讨了。

---

<sup>①</sup> 我另有一篇文章介绍各种对性革命的反思:《性革命:文化、哲学和宗教角度的反思》,见《基督教文化学刊》,第四辑,185~223页,2000。